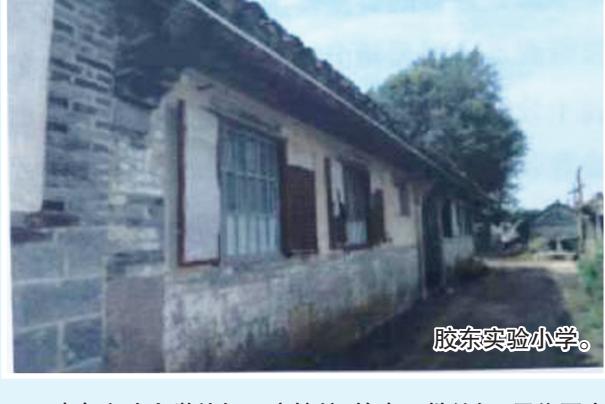


战时胶东东部的三所革命学校

□曲延科

东海中学的教育质量很高。1946年底,初中部二、三年级毕业生大都升了学,考入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、山东建设大学、胶东化学研究所、山东军政大学等;转业军人大都回到部队,也有的调到地方党政机关,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。



胶东实验小学就如一座熔炉,炼出一批纯钢,用作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从这个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生,奔赴全国各条战线,参军参政,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突出贡献,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。



东海中学学生。

革命工作人员。

胶东实小由胶东行署干部李国屏任名誉校长,郑铭石任校长。1944年,郑铭石调胶东行署工作,曲克继任校长。同年,曲克调任牙前县教育科科长,刘任之继任校长,直至实验小学撤销。胶东实小配备教导主任、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。教导主任负责师生的思想品德和纪律教育;教务主任专司师生教学业务;总务主任分管财务和后勤。教导主任由刘任之兼任,教务主任是林晓枫,总务主任是孙建华,干事是黄海。教师由胶东各县机关、学校选拔素质较好的知识分子充任,其中有不少文登、莱阳乡村师范毕业生,如语文教师孙凤巨、算术教师邹本野、史地教师王吉光、音乐教师矫秀清等,教学水平都很高;还有修孟干、孙劫之、刘凤梧、王白石、黎岩等老师,都曾先后在胶东实小任教。

学校共有学生200余名,一、二年级合编为复式班,三、四、六年级各设一个班,五年级设两个班。学生分公费生和自费生两种。公费生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亲属,少数是机关放下的年少体弱小兵。公费生年龄较大,多在五、六年级就读,其中有许世友司令员的爱人,姓田(后改名田普);东海军区司令员于恭恭的儿子;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的妻子蔡英萍;海军司令部郑道济的儿子;牟平县长郑省农的妹妹郑慎之;胶东国防剧团领导人栾少山的儿子栾紫然;国防剧团演员曲云;胶东报社译电员刘思仁等。这些公费生虽然年龄不大,但政治上都比较成熟,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。他们学习极为认真,大多数都是班里的优秀分子。毕业后,胶东行署分配工作,中途调回原单位或参军参政的也有。自费生是埠西头村和周围方圆二十多里村庄招收的学生。当时学校周围的孩子都愿意到胶东实小读书,因为学校不但传授文化知识,还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,教育质量远非一般学校可比。自费生中优秀分子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,自费生学生会主席杨玉洁(女,下杨家村)和姜秀英等都是品学兼优学生的代表。

学校经费由胶东行署拨款供给。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,学校除了没有外语,其他与现在中学课程基本相同,有国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音体美,时事政治占课时较多。教材主要是自编、摘编讲义。办学经费由东海专署批拨,学生食宿费由昆嵛山布厂提供,牟平城东老人村有二三十亩地(公产)提供部分粮食和蔬菜。教师工资(每人每月300斤小米)、学杂费、讲义费、学生伙食费都是通过这几条渠道解决。学生吃的是地瓜干、玉米饼子、豆面渣和萝卜、白菜汤,白天很少见。中学部学生基本走读,师范部学生住宿,没有床,都是就地铺麦秸草。学生大多数只有一床被子,冬天卷着筒睡,夏天拆成单片盖在身上睡。城隍庙地势低洼,非常潮湿,睡在城隍庙大殿里的女生大多生过疥疮。

学校的教育质量很高。1946年底,初中部二、三年级毕业生大都升了学,考入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、山东建设大学、胶东化学研究所、山东军政大学等;转业军人大都回到部队,也有的调到地方党政机关,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。

1947年夏季,国民党进攻胶东。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和轰炸,学校搬到城东小曲家庄村和城东三官庙。当年9月,敌第二十五师进驻烟台(现芝罘区)、牟平,形势进一步恶化,校部迁至牟平城南40里的曹格庄村,学生全部疏散回家。1947年12月,东海中学东迁至离牟平县城100多里的文登县于埠村,继续开课。这次开学,到校的学生只剩下200多人,大多是原解放区入学的学生。这里的条件更差,无教室无桌无凳,学生分散在老百姓家里,就地铺麦秸草,白天当教室,晚上当宿舍,授课方法是老师讲、学生记笔记。一开始,同学们有的趴着写、有的跪着写,后来都会写了在膝盖上写。那时蒋匪军已占领烟台,徘徊在牟平沿海一带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,敌我斗争十分激烈,学校的学生班长多是地下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,学生大都是进步青年。他们政治上都很敏感,阶级斗争观念强,既是在校学生,又是革命工作者,积极加入党在农村的各项工农运动,边读书,边积极宣传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,动员青年参军支前,与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反动言论作斗争,遇到个别教师家庭成分高而受到冲击散布不满情绪和社会上“特嫌”分子散步反动言论,学生们都能及时进行宣传教育和批评斗争。因此,敌对势力对东海中学的学生恨之入骨,总是伺机报复。1948年新年那天晚上,全校师生晚上吃的白面馒头被敌特分子下了毒,幸亏驻在学校附近的东海专署医院立即组织抢救,才没有死人。当时由于形势紧迫,此案没有来得及侦破。

由于形势继续恶化,学校于1948年1月中旬(腊月二十三日)宣布停办。同年11月底形势好转,学校又在文登县许埠村复学。至1950年夏季,坎坎坷坷历经十年的东海中学最终停办。

根据地小学的楷模——胶东实验小学

胶东实验小学(简称“胶东实小”)由胶东行署于1943年在牟平县凤凰崖村(今属乳山)创办,同年迁入牟平县埠西头村,与埠西头小学合并,名称仍为“胶东实验小学”。胶东实小与胶东军区司令部住在同一个大院里,这里原来是一户地主的家,有十几间房屋,南厅住着许世友司令、警卫员和司令部参谋处,正房为胶东实小所用。

胶东实小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,办学宗旨是:通过教学实践,总结抗战时期的小学教育经验,用以全面推广;为军政子弟、亲属及胶东各机关在反“扫荡”中不能随机关迁移的少年儿童提供学习场所;培养有政治觉悟、有文化知识的

一所军事化学校——文牟联中

文牟联中是我东海区行政公署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发展需

要,于1944年6月以原二牟联中为基础扩办的一所初中、师范混合学校,校址在文登县小观村。原二牟联中由东海行署于1943年8月创办,地址在牟平县古村(今属乳山)。二牟,即牟平、牟东二县。牟平于1947年10月分为牟平、牟东两个县,1948年6月又合并为牟平县。

文牟联中有教职员100余人,校长胡湘夫,教导处主任刘仁,总务处主任宫树华,教师王力平、姜耀华、刘恒、王素芝、刘德川等。辅导员有梁斌、丁宁(女)、祝立。教导主任、总务主任、辅导员都兼课。学生设四个中队,师范部、初中部各二个。师范部六个班(也称分队),初中部六个班,在校学生有700人左右。课程设置有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、生理卫生等。教材由学校自选、自编、自刻蜡纸油印。

教师和学生来源:领导成员和政治、军事教员、辅导员是从地方政府和部队派来的党员干部;文化教员则是从根据地吸收来的具有高中、大学文化和抗日爱国热情高的知识分子,有些人来校前就是中学教员。这些教员以非中共人士居多。学校学生,一是根据地高小毕业生;二是由党政军部门转来的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;三是从敌占区来的爱国青年。学校都没有固定的教室,没有桌椅,以树林、场园、祠堂为课堂。上课时,学生席地而坐。每班有一块黑板,上课带来,下课带走。文化课以班为单位授课,军事、体育、政治课则以同级为单位上大课。学校没有集体宿舍,师生男女分别住在群众家里,铺麦草,睡地铺。遇到敌人“扫荡”时,学生就化整为零,分散在群众家里。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。教职员每月工资一百多斤粮食,包括伙食费、服装费。学生一律吃公粮,服装、被子除党政军部门转来的和生活困难的享受公费待遇外,其余学生自备自带。师生就餐很清苦,口粮以粗粮为主,一年到头吃盐水,喝菜汤,偶尔改善生活就是吃顿饺子。反“扫荡”期间,师生都分散在群众家里,把菜金、粮票交给群众,与民同吃同住。师生如同军队般过军事化生活,作息时间和出操、吃饭、上课、自习、晚点名、睡觉等活动,都按八路军模式严格管理;开荒生产,做群众工作,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。条件虽艰苦,师生却以苦为荣,士气旺盛,团结上进。

学校的办学宗旨是:“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根据地的建设、军队建设培养输送人才。”政治教育,学习社会发展史、政治经济学、大众哲学、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,注重学生人生观、世界观教育,激发学生爱国热情,增强抗日信心。军事教育,在学好《论持久战》等理论的基础上,教授学生列队、行军、宿营、站岗放哨等军事常识,同时引导学生走出校门锻炼。1944年暑假,文牟联中组织两个连参加由胶东区党委、行署组织的胶东根据地所有中学的男生(年小体弱者除外)学兵团,到任常伦烈士追悼大会”等大型活动,表现都很出色。在任常伦烈士追悼大会上,许世友司令员致完悼词后,胶东实小学生倪照文还深情地指挥大家齐唱了追悼歌。

在教学与管理方面,胶东实小根据少年儿童好学、好奇、好胜、自尊的特点,摸索总结出“四原则”的教育方法:善于发现学生优点,多表扬,少批评的鼓励性原则;用暗示的方法启发学生自觉改正缺点的暗示性原则;顺应儿童天性引导学生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因势利导原则;持之以恒,常抓不懈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反复训练原则。这些经验不仅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,就连敌占区不少学校也前来学习。1943年12月寒假期间,牟平县组织104名敌占区学校的教师在埠西头村举办了20天训练班,推广胶东实小的办学经验。

胶东实小在抗战胜利后迁至莱阳。这所学校在牟平只存在了三年多时间,不仅创造出许多战时办学经验,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。1996年夏天,曾经在胶东实小读书的国家新闻出版署长于友先同志,专程去埠西头村寻找当年的踪迹。他说他是作为干部子女在胶东实小读书的,尽管时间只有三年,却为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是因为,一来胶东实小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学到好多新文化、新知识;二来学校与胶东军区住在同一大院,与胶东行署、军区医院和好多政府部门住在同一个村子里,经常见到首长和工作人员认识的身影,看到进进出出的伤病员,耳濡目染,从小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。特别是参加战斗英雄任常伦的追悼大会,心灵受到很大震撼,从小就立下革命志向,要参军杀敌,为革命烈士报仇。他说当时胶东实小毕业的学生不仅公费生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,自费生也有不少参加了革命工作。

胶东《大众报》曾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胶东实小学习英雄精神、踊跃参军参军的故事。

高峰在《回忆在胶东实验小学的日子里》一文中说:“实小就如一座熔炉,炼出一批纯钢,用作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从这个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生,奔赴全国各条战线,参军参政,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突出贡献,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。实小的老师,一部分仍在教育战线培养人才,一部分参军参政。就我所知,新中国成立后,陈新老师曾在《大众日报》任职;郑铭石校长调任省教育厅厅长,后调至山东师范大学做领导工作;刘任之老师在人民大学人事处供职;李岩老师去了延安;矫秀清、王白石老师夫妇二人同调天津市委宣传部。”

1945年5月初,为迎接大反攻的到来,东海区党委、行署要求学生提前毕业,6月底完成学生分配,此后再未招生。

学生毕业后的去向,采取自愿选择和组织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进行。大方向是参军到部队或参政到地方。学生们的选择多是参军。被分配到胶东军区教导团、鲁南抗大一分校、胶东军区参谋训练班、胶东军区机要报务训练班、部队卫生学校和到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工作的,共有460多人,占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二。参政到地方的学生,有的分配到胶东建国学校学习,有的分配到东海地委试验区、党校、地方政府及群团部门工作,还有的分配到新闻训练班学习。仅有少部分学生被分配到根据地农村小学教书。临别时,学生群情激昂,斗志昂扬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抗日毕业歌,流着激动的眼泪互相告别,恋恋不舍地离开学校,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。

这些学生出校后,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单位的骨干力量,为部队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文化风景

乡
戏

□程绍堂

20世纪70年代前,农村文化生活匮乏,乡村夜戏成了农村最受欢迎、最为普遍的文化生活,几乎村村都有戏班子和土戏台。演员是本土生土长的,戏台是用石砌筑成的,或用泥土夯成的。过年正月十五这段时间,村里的戏班子几乎天天都有演出,陆陆续续一直演到正月底,你来我往,相互串演,不亦乐乎!

我们村虽然是个百余户的小山村,可演戏的积极性却很高,《龙凤呈祥》《罗衫记》《搜书院》《墙头记》《王定保借当》《王小赶脚》《小姑贤》《王汉喜借年》等传统吕剧都演过,不但剧目受欢迎,而且演出水平令人称道,在四邻八乡颇有些名气,一度成为竞相邀请的香饽饽,一个正月几乎不闲着。

排乡戏,是最早的“年味”。每年到了冬闲时节,尤其是进了腊月门,村里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排戏。学校放假后,教室成了村里排戏的场所。最先得知排戏信息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们,排戏伊始,就开始探班。排戏是避免闲人干扰的,门不让进,可窗户你不能堵上。于是,窗户被小脑袋一层层堵了个严实。窗户一堵,屋里光线暗了,影响排戏,人家便赶着走,无奈,只好远远站着。

进入腊月二十后,排戏进入高潮,已经动了丝竹锣鼓,声音很远就能听到。离过年还有三五天,开始搭戏台,戏台的四个角埋下四根对插粗的木杆,木杆的顶部拉上几根用来悬挂布帘的绳子,简易的戏台就算搭建好了,看戏的日子也就快到了。每当此时,孩子们便激动不已,奔走相告,戏台成了他们嬉戏玩耍的场所。

大年初一晚上,村里的乡戏正式开台。太阳还没落山,就有人在戏台前摆上凳子、木墩等占据了中心位置。夜幕降临,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出动了,络绎不绝的人们扛着凳子、拎着马扎,呼儿唤女,从四面八方涌向戏场。周边村的人也结伴而来,人一拨接一拨,大呼小叫此起彼伏,给夜幕下的村庄增添了无限的热闹和喜庆气氛。

最活跃的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,开戏之前,他们像放火龙一样,四处乱窜,追逐嬉戏,雀跃欢呼,胆大的时不时跑到台上翻跟斗,做鬼脸,手持木棍练对打,溜到后台看演员,一掀布帘,演员还在化妆呢。“去看!”孩子们吐一下舌头,又窜到别处去了。

坐在戏台最前面的大都是本村扶老携幼和上了年纪的人,青壮年和外村人多半站在后面和周边,脸皮厚的小伙子使劲在人群中向前挤,猴儿精的孩子则爬上了周边的树梢和墙头,站在边远处者则在人群中踱来踱去,碰上亲朋好友,争着掏出廉价香烟,互让一番,然后你一支,我一支,边悠然地吸着烟边闲聊……这种场面和氛围,是庄稼人最难得的放松时刻。

突然,清脆的报幕声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戏台,戏场顿时安静下来,乡村的夜戏就在这热乎乎、暖烘烘的特有的气氛中开演了。

上了岁数的人看戏最专注,完全被剧情所吸引和感染,易于共鸣伤感;看到贤士忠臣蒙冤落难,奸佞小人残害忠良,便义愤填膺,痛恨昏君无能,怒斥奸臣狠毒;看到孤儿寡母患难或义女蒙冤,同情的泪水会止不住地流;看到抛弃糟糠之妻或恶妇虐待公婆的情节,心中的委屈和哀愁便涌上心头;看到欢乐开心处,又会笑出泪来……一场戏下来,悲愤的泪、同情的泪、伤心的泪、欢喜的泪,会沾湿袖头。

演出开始,孩子们在大人的呵责声中安静下来,没过多时便倚人而眠或在大人的怀中睡去。一阵紧凑的锣鼓声将孩子们从梦中惊醒,有的揉着惺忪的双眼,眼急着要撒尿。望着四周黑压压、水泄不通的人群,大人只得让孩子就地解决,顿时一股淡淡的尿臊味扩散开来,但却丝毫不影响周围看戏人的兴头,根本没有人理会。

年轻人对看戏似乎不那么感兴趣,但是对戏场这种场合却求之不得。有情有意的年轻人会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,选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站定,悄悄说着情话,一场戏下来谁也说不出唱的是啥。最不专心看戏的是那些到了谈婚论嫁年纪的小青年,尤其是单相思的愣头小伙,旁若无人地躲着脚伸长脖子在人群中搜求“心中玫瑰”,发现目标就毫不顾忌地朝着目标挤去,使人群一阵波动,惹得众人怒视,啧有烦言。那些热恋中的情人更是如鱼得水,上哪找这天赐良机,说是看戏,倒不如说是相会,不等戏开演,就躲着人们的视线,迫不及待地牵手溜走,寻找属于二人的小世界。这时,草垛成了最佳去处,避风、僻静、无人搅扰,非常适合恋人卿卿我我,伴着他们的只有繁星和阵阵的乡戏锣鼓声。

过了正月初五,也称“破五”,村与村之间开始交流乡戏,你来我往,有时还暗较劲,看谁演得好。啥叫好?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谁演出台下观众多。为保证演出时不冷场,不丢面子,挣得好名声,村人想出了一个办法,叫上村里一些人跟着去充数,名曰“护台”,捧场人,以壮声威。我虽没跟着去“护台”,但听到村人议论前一天晚上在哪村演出,看戏的人老鼻子了,叫好声不断时,既高兴又自豪。

过完正月,戏台上的木杆被挖走,一年一度的乡戏也就宣告结束。村民们尤其是孩子们意犹未尽,惋惜地看着被拆卸的戏台,那股兴奋的心劲,这才慢慢地平缓下来。

如今,这种乡戏在农村越来越少,这种气氛也越来越淡。然而我总觉得,无论什么演出,都无法表达乡戏烘托出的那种特有的乡情和味道。



农历正月十五,福山区元宵节举行大型民俗表演活动——“秧歌进城”,让很多老年人想起了当年的乡戏。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摄